

字尚建筑

——出版物设计新旧载体探究

边琨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字尚建筑

——出版物设计新旧载体探究

边琨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字尚建筑:出版物设计新旧载体探究 / 边琨著. --
延吉 :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634-9684-6

I. ①字… II. ①边… III. ①出版物—设计—研究
IV. ①TS8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1745 号

字尚建筑:出版物设计新旧载体探究

著 者: 边 琨

责任编辑: 关志明

封面设计: 崔新新

出版发行: 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址: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 133002

网址: <http://www.ydcbs.com>

E-mail: ydcbs@ydcbs.com

电话: 0433-2732435 传真: 0433-2732434

发行部电话: 0433-2732442 传真: 0433-2733056

印刷: 济南文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90×260 毫米 1/16

印张: 8.75 字数: 140 千字

印数: 1000 册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978-7-5634-9684-6

定价: 40.00 元



作者简介

边琨, (1982.08-), 女, 回族, 籍贯: 山西太原,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在读硕士, 工艺美术师 (艺术中级)、责任编辑 (出版中级), 主要研究方向: 设计艺术学。

前言

出版物的装帧设计是吸引读者(消费者)的关注并达成购买意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出版物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在经营活动中,其形象直观的装帧语言会对出版物起到积极的推介作用.由于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不断发展、竞争日趋激烈,使装帧设计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含量越来越高,风格也越来越多样化。

装帧设计要准确迅速地传递作品创意内涵,使创意质量和品位不断得以提升。在不同程度地体现上述设计理念的前提下,有的装帧设计作品还打破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装帧形态,把原装帧理论间的色彩关系、形体尺寸关系和份量关系等进行合理夸张,吸引读者(消费者)去观察分析,寻求释然,诱发对装帧设计物更深层的认识。

书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书籍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类思想精神传递不可缺少的工具。书籍不仅记载历史,传播科学,普及文化,更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一部书稿在印刷之前,对书的形态、用料和制作等方面所进行的艺术和工艺设计,其内容包括开本、封面、护封、书脊、版式、环衬、扉页、插图、插页、封底、版权页、书函在内的开本设计、封面设计、版面设计以及装订形式、使用材料等。封面设计一般由文字和图像两部分有机构成。书籍的装订形式与排式有关。中国大多是横排书,采用的装订形式有精装本、平装本、单行本、普及本、袖珍本、特藏本、豪华本等。此外,还有飘口、圆角、包角、检标、毛边等装式,书脊有圆脊和方脊之别。

目 录

第一章：有载体的出版物的产生与演变	1
第一节：出版物载体的演进及规律	1
第二节：文字书的载体材料	9
第三节：早期出版物的形式与图书载体材料变迁	13
第四节：图书载体材料变迁原因探究	16
第五节：探索出版物装帧设计的新形态	19
第二章：纸	24
第一节：纸的发展历程	24
第二节：纸的种类	27
第三节：机制纸与机械印刷的出现改变了书籍形式	30
第四节：PVC 纸	36
第五节：特种纸	38
第三章：立体出版物常用的装帧材料	44
第一节：皮革	45
第二节：木材	48
第三节：纸张类材料	49
第四节：织物类	51
第五节：金属	55
第六节：塑料	56
第七节：油墨	58
第八节：材料特性在立体出版物装帧中的作用	60
第四章：现代装帧技术	64

第一节: 三 D 全息影像技术	64
第二节: 电子出版物	73
第三节: 电子期刊	76
第四节: 随书光盘	78
第五节: 电子杂志	79
第六节: 阅读器	82
第五章: 中国的装帧材料历史概况	85
第一节: 中国出版物与装帧设计的历史演进	85
第二节: 时代变革对出版物装帧设计材料的推进	91
第三节: 材料在出版物装帧设计中的综合运用和发展趋向	100
第六章: 装帧材料的作用与价值	111
第一节: 材料在出版物装帧设计中的表现性及作用	111
第二节: 装帧材料在出版物装帧设计中的作用	114
第三节: 材料与工艺结合的体现	119
第四节: 装帧是一门艺术	128

第一章：有载体的出版物的产生与演变

第一节：出版物载体的演进及规律

按照出版物载体的演变过程将其分为四个时期甲骨时期、简帛时期、纸张时期、电子时期。中国编辑活动从有文字的文献产生就已经开始了。甲骨时期的编辑活动主要是从事文献材料的收集、分类编序,使其便于收藏和流传后世的社会文化活动;简帛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出版物编辑活动,是中国编辑业务的奠基时期;纸张时期编辑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职业,而且其分工越来越细,出现了不同专业的编辑业务;电子时期为编辑业务的内容和形式又开辟了新的领域。编辑活动的历史表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进步推动了出版物载体的演变,而出版物载体的演变又推动了编辑活动的发展,中国的编辑活动也经历了收藏编辑、著述编辑、出版编辑和电子编辑四个阶段。

1. 甲骨时期

语言产生和劳动工具的使用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标志,而文字的产生则是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人类创造文字,一是主观上适应社会文化交流的需要,二是客观上起到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的效果。较之语言,文字符号更具有表意的优越性:讯息密集、载体规范、传播范围大,较少受具体时空的限制。如果说语言的初始创造尚带有人际之间直接交流的随机性的话,那么,创造文字符号的原始动机,就是从考虑讯息记忆、讯息贮存和讯息传播的社会需要出发。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我国最早用来记录文献的物质材料是甲骨、玉版和钟鼎。这种材料的特点是加工困难,价格昂贵,然而铸刻上去的文字却不易磨灭,能长久保存。这一特点又正好与当时文字资料的主要功能相适应。那时人们将文字资料记录下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是为了保存历史档案,供后世子孙缅怀祖先的业绩,还多少含有一些供后人借鉴的意思。这类文献典籍,实质上是高级贵族为自己营造的纪念碑,当然要不惜工本地采用贵重而不易磨灭的材料来制作,希望“子子孙孙其永保之”。甲骨文解读的结果表明,我国殷代已有档案的收集和整理,甲骨文献的收藏已相当有序,表现为甲骨文的编排遵循一定的规则,骨

片的排列标有序号,甲骨文献“册”的形式,当是出版物的创始,由此可以断定从那时起就有人从事编辑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编辑”条目讲:“中国的编辑工作出现很早。追溯历史,可以从殷商时代说起。《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周人说商代已有文字记录的典册。已经有人从事编辑整理简册的工作,应该是可信的。不过没有专人从事,而这主要由史官以及巫师等古代的文化官兼做,大多述而不作,偏重整理考定,选存文献史料。”

因此,中国编辑活动从有文字记录的文献的产生开始,是比较科学的。甲骨时期至迟在殷商时代已经开始,到西周后期结束(即公元前 17 世纪之前至公元前 8 世纪),至少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当然,甲骨文是否为出版物,目前尚有争议。现今出版物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即经过编辑、可以复制、用于传播。甲骨文虽然主观上不是为了传播,但实际上是代代相传而起到了传播的作用。同时,甲骨文也经过编辑,也可以进行复制,只是不能大量和快速复制而已。因此,作者认为甲骨文可以视为比较原始的出版物。总之,甲骨时期的编辑活动是主要从事收集文献材料、分类编序,使之便于储藏和留传后世的社会文化活动。可以称之为“收藏编辑”。

2. 简帛时期

所谓的简帛时期,实质上包括两个阶段,即简牍阶段和缣帛阶段。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和文化积累,新的文献不断增加,旧的文献还需要妥善保存,以甲骨为代表的出版物载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西周后期简牍取代了甲骨、钟鼎。简牍制作方便、价格低廉,易于普及;书写代替了契刻,使得文字记录比甲骨文方便得多。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断进步,对社会秩序的管理显得越来越复杂,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于是出现了作为统治者助手的社会知识阶层——士。中国最早的书,便是出现于周宣王时代的识字课本《史摘》,这是一种用大篆写在简牍上以“士”为教育对象的启蒙读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士”的教育水平也不断提高,于是出现了一些教育“士”的著名大师,孔子便是其中之一。他将过去遗留下来的文献档案,按自己的政治见解删订整理,编成几种教育“士”的教科书,文献档案经过选编成为传播知识的工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出版物编辑活动。

简册笨重而体积庞大,用其大量收藏文献就难免堆积如山,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文化进步的需要,于是就有人用缣帛作为记录文字的物质材料,这对阅读和储

藏都较简牍更为方便。缣帛这类织物虽由来已久,但将其用作文字载体大约是从东周初年(公元前 770 年)开始的,进入西汉以后,比较普遍地用于抄书,当然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帛书的较普遍的应用,使官庭大规模藏书成为可能,并且可以采取较为科学的管理方法。但是,由于帛书的价格过于昂贵,只能成为简册的一种辅助书写材料,还不能大规模地应用于文字记录。在这一时期,以刘向父子为代表的宫廷文官对我国古代留下来的古籍进行了大规模的编校整理工作,经过这次校理典籍,中国出版物的基本格式和编排体例大致形成。

简帛时期从西周后期(公元前 800 年)简册出现到西晋(公元 300 年)帛书在宫廷的较广泛应用,前后大约经历了 1000 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前半部分的编辑活动仍以校理典籍为主,即主要是收藏编辑工作。但自孔子以后,学者著述立说逐渐形成,例如司马迁编撰的《史记》不仅是选材精审、史实可靠、论断卓越、文笔生动,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史书编排的新体例,而且这一体例一直被历代史学家所沿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后半部分的编辑活动可以称谓“著述编辑”。另外,帛书的性质和形态与后来的纸张比较接近,对后来出版物的形态(如界栏、边框、卷轴装)有直接的影响。总之,在简帛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出版物编辑活动,是中国编辑工作的奠基时期,是出版物装帧概念的萌芽时期。

3. 纸张时期

造纸和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重要两项,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虽然东汉后期我国已经发明了可供写字的纸张,但纸张取代简帛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写材料,还是到西晋以后。经过长期工艺上的改进,西晋时代纸张已成为最理想的书写材料。由于它价廉物美,使得出版物成为一般民众也有能力购买的东西,由此而一步步突破统治阶级为垄断文化而设置的种种樊篱。纸张书写方便,因而出版物的编撰也再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许多专业出版物和大部头著述都在这一阶段问世,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知识交流和文化繁荣。因为纸张不仅可供印刷,而且运输和保存也很方便,这样就使出版物的大量复制和发行成为可能,因此纸张也就成为乃至今天仍在使用的最好的一种出版物载体。造纸和印刷术的应用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编辑工作也由此成为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出版编辑”。这一阶段是编辑业务大发展时期,不仅有各类图书的编辑,而且还突破出版物的框架,出现了报纸、杂志编辑。

纸张时期按照出版物生产手段和复制、发行方式的进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手抄阶段、手工印刷阶段和机器印刷阶段。手抄阶段大约是从西晋到北宋初年,应该说这是帛书时期的延续,手抄阶段的出版物以卷轴形式出现,它的装帧还是沿袭帛书时代的式样。在这一阶段编撰了大量类书和史书,其中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具影响。手抄阶段的编辑工作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规模也相当庞大,然而这些编辑机构都是由政府为编辑某部书而设置的临时组织。因此,在这一阶段编辑工作尚未形成社会上的一个专门职业。

手工印刷阶段大约是从北宋初年到清朝末年,虽然在唐朝末年印刷术已开始应用于出版物的复制,但由于当时的技术不过关,质量较差,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甚至明朝初年著名《永乐大典》的复制还是采用了手抄本。北宋初年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普及,政府已无法垄断出版物的印刷业务,社会上出现了私人的出版商和出版业。随着出版业的兴起,出版物成为大宗商品,为了提高印刷品的竞争能力,出版商既要选择拥有广大读者的选题,又要千方百计提高出版物的编辑质量,于是“三校三审制度”由此而建立,编辑工作逐渐地成为出版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机器印刷阶段从19世纪西方印刷术传入我国至今,是我国印刷品的机器印刷时期。机器大生产改变了出版商手工工业化的组织结构,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建立起来的近代出版社,组织严密,分工精细,编辑部从发行部和出版部中相对地独立出来,从而改变了千百年来编校合一的局面。

纸张时期从西晋直到今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出版物的生产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编辑业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职业,而且其分工也越来越细,出现了不同专业的编辑工作。

4. 电子时期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类进入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物质生产方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类已经逐步进入现代工业社会。19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磁带和胶片的发明与应用,二者很快成为以模拟式电子信号记录文字、图像、声音或其他符号的载体,并迅速发展为广播、电影和电视媒介,人类历史上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出版物——电子出版物,音像出版物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目前,公认的六大媒介是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影和电视,其中后三者的物质载体的本质都是模拟式电子信号,以模拟式电子信号为物质载体的出版物就是模拟式电子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的诞生,标志着出

版物的物质载体已经进入电子时期。同时,也标志着第四次信息载体革命的开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日臻成熟,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不仅解决了信息数字化的问题,而且征服了比文字更复杂的音像世界。如今,表现和记录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数字、语言、文字、声音、图画和影像等信息,都可以用计算机的二进制语言来进行数字化处理,形成数字式电子信号,既可以将其储存于光介质(光盘)或磁介质(磁盘)的材料上又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同时,在模拟式电子出版物的基础上有出现了数字式电子出版物。数字式电子出版物改变了传统六大媒介相互之间界限分明的各种信息传播方式,多媒体、交互性、实时性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六大传统传播媒介在形式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或消失,人类真正进入了信息时代。这也标志着第五次信息载体革命的开始。

尽管到目前为止电子时期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电子出版物越来越显示出其信息容量大、保存时间长,多媒体、交互性与实时性传播等诸多优越性。目前的数字化图书、数字化期刊和网络媒体与传统的书、报、刊相比较,无论是形式还是功能都有天壤之别。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工作与传统的书、报、刊相比较,有其专业性很强的编辑业务,因此编辑业务中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专业,即电子出版物编辑,编辑业务又有了新的领域,编辑业务也进入了“电子编辑”的新时期。

5. 演进的规律

早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日常物质生活用品和精神生活用品,原始陶器、殷商甲骨、周朝青铜器都不是独立的、专门的文字载体,其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而不是承载文字。就原始陶器来说,主要是日常物质生活用品;就殷商甲骨来说,主要是占卜活动用品,在当时的巫祝文化背景下,商王要通过请示天地鬼神来决定行动计划;就周朝青铜器来说,主要是作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等王室贵族的专用器。中国真正独立的、专门的文字载体始于简牍,此后,文字载体向着轻便、价廉、容量大、浏览方便、易储存的方向演变。但是,考察文字载体演变史,我们会发现一种新载体出现后,往往不会马上取代旧载体,而是新、旧载体持续并用一个时期。在中国文字载体发展史上,曾经有过缣帛与简牍并用,纸与简牍、缣帛并用,如今又出现了电子媒介与纸的并用。新的文字载体为什么不能马上取代旧载体,从下面的论证中或许会找到答案。

6. 缣帛与简牍并用

简牍使文字载体走向了独立,但简牍最大的缺点是笨重,并由笨重带来携带不便、浏览不便。如秦始皇每天处理的公文达 100 余斤(《史记·秦始皇本纪》)。解决文字载体的笨重是简牍时代人们最大的心愿,于是,人们发现了缣帛。跟简牍比较,帛书有不少优点,如质地柔韧,容易吸墨,书写方便,可长可短,又可随意舒卷,便于阅读和收藏;分量很轻,便于携带等。汉代是帛书最流行的时期,在国家藏书中,凡重要的典籍多用帛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儒家经典,如《诗》、《尚书》、《礼》、《春秋》等,都用帛书,以表示郑重和珍贵。东汉末年,董卓强迫献帝移都长安,将士竟然将国家图书馆的缣帛图书拿来作帐篷、车篷、行军袋等(《后汉书·儒林传》),可见汉代帛书数量之多。

汉代帛书虽然很多,但文献和考古都证明帛书仅与简牍并行。《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书,简牍称篇,帛书称卷,称卷的是少数,大多数称篇,可见简牍在汉代仍是主要的文字载体。汉代还有“三尺法”、“尺牍”的说法,书写法令的简牍最长,达三尺,因而汉代称法律为“三尺法”;一尺见方的木牍称“方”,汉代以后用于书写私人书信,故称“尺牍”。“三尺法”、“尺牍”等称呼的流行是汉代以简牍为文字载体的有力证据。此外,甘肃武威东汉墓曾出土长 55·5 厘米的《仪礼》简策,这与王充在《论衡》中所说的“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朝夕讲习,义类所及。故可务知”正相符合,证明汉代曾以简牍作为儒家经典的书写材料。

缣帛之所以不能完全取代简牍,主要原因是缣帛成本很高,产量有限,价格昂贵,不能普及。《后汉书·蔡伦传》就说“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据现有资料,在汉代,一匹粗缣值六百余钱,一匹白素值八百余钱。折合汉代平均米价,一匹缣相当于六石大米的价格。价格昂贵限制了缣帛的使用范围,所以汉代帛书的使用主要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藏书,二是绘画,三是达官贵人等社会上层的书信。从缣帛与简牍持续并用的史实可见,新载体不能取代旧载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源于新载体本身:新载体虽然有旧载体所不具备的优越性,但在使用中也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7. 纸与简牍、缣帛并用

从东汉到东晋数百年间,存在着简牍、帛书和纸书三者并存的局面:官方文书仍用简牍,重要图书多用帛书,纸书则从下而上逐步推广。1996 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走马楼第 22 号古井内发现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数万枚,其中基本

完好的有2千枚以上。这批数量惊人的简牍除去10块大木牍外,都是竹简。大木牍约容100~160字,竹简每枚平均20字左右。这批简牍都是官方文书,主要是券书、户籍簿、司法文书和账簿等经济类文书,时间断限为孙吴嘉禾元年至六年(232~237年),这是官方文书仍使用简牍的明证。

在官文书坚持使用简牍的同时,有钱的贵族也看重缣帛而轻视纸张。由于缣帛产量有限,价格昂贵,只能在上层贵族内使用,因此缣帛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达官贵人借缣帛以示尊贵,这成为推广用纸的社会心理障碍,纸因此长时间得不到上层贵族的承认。东汉末年的学者崔瑗与友人葛元甫的信中说:“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表明纸被认为是贱物,贫寒之家才不得不用。西晋左思《三都赋》脱稿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对《晋书·文苑传》的这段记载,一般认为豪贵之家也用纸书写,反映了贵族“贵素贱纸”观念的改变。而笔者认为,豪贵之家“竞相传写”的只不过是一篇流行的文章,这恰恰说明纸张在当时贵族心目中只适应时尚,而真正严肃的、有价值的东西仍需传统的书写材料。

官方文书用纸取代简牍是在东晋。东晋元兴元年(402年),桓玄据建康自立称楚帝,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个法令标志着简帛时代的结束。由统治者下令以纸代简,说明纸的推广成为不可阻挡的大势。就纸张取代简帛这一点,桓玄算得上一个改革者。南北朝以后,纸书风行全国,这可以从敦煌遗书中得到充分的实物证明。

以我们今人的看法,纸的优越性远远大于简、帛,既廉价轻便,又容易书写保存,可为什么在郑重场合受到排斥?是纸张质量不好吗?答案是否定的。1924年在新疆鄯善出土的《三国志·吴书》残卷,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发现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都证明西晋的纸张质量很好。纸张之所以在郑重场合受到排斥,与人们固守传统的观念有关。其一,在古代行政领域中,传统的力量十分强大。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祖宗一直使用的是简牍而不是纸张,若加以改变便有“不敬”之嫌,这个风险是不敢轻易去冒的。其二,人类似乎有一种共性,抛弃熟悉的东西会感到痛苦,越是固有文化根基深厚的人越是如此。对于当时的贵族来说,他们熟悉的是简书、帛书,他们习惯用简、帛书写,所以便排斥纸张。

当然,纸张并没有因贵族的排斥而中断普及化的趋势,相反它以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取代了简、帛。由纸与简、帛并用数百年及最终取代简、帛的史实证明,强大的传统观念是阻止新载体取代旧载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新载体的无比

优越性会逐渐弱化人们的传统观念,当新载体低成本、高效益的优越性充分显示的时候,新载体就会取代旧载体。

8. 电子媒介与纸并用

1978年,兰开斯特在其著名的《通向无纸情报检索系统》中预言,无纸社会将在20世纪末不可避免地到来。但是我们看到,无纸社会并没有真的如兰开斯特所言已经到来或正在到来,也就是说电子媒介并没有取代纸质媒介。从市场情况来看,电子出版物确实增长迅速,但纸质媒介的生产和销售也呈上升趋势,我们每天仍在大量接触纸质媒介,包括图书、报纸、杂志等。

电子媒介之所以不能取代纸质媒介,既有媒介本身的原因,也与人们的观念不无关系。从媒介本身来看,目前电子媒介虽然有纸质媒介所不具备的优点:体积小、储存密度高、传递迅速、形象生动等;但纸质媒介也有电子媒介所不具备的优点:价格低廉、装帧漂亮、携带方便、阅读便利等。另外,电子媒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标准化问题、相容性问题、版权问题等目前也没有解决。数字化图书馆甚至被人戏称为“脆弱的图书馆”。目前的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在特性和功能上是相辅相成的,谁也不能取代谁。

从人们的观念来看,每当一个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产生时,总会引起“现代派”和“传统派”的争论,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这几乎是一条定律。“现代派”是新传播技术、方式的使用者,而“传统派”是原传播技术和方式的保护者;“现代派”看到的是新传播技术、方式的优点,而“传统派”看到是缺点。历史上中国人对纸的态度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西方亦如此。如希腊文字出现后,苏格拉底认为,这会造成人们依赖文字而使记忆萎缩;许多口语词汇只能给出一种文字形式表达,无法展现口语对话中的多种语境;当时记忆一部史诗所花费的时间,远远少于为了掌握记录的文字体系而花费的时间。苏格拉底的观点当然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文字的优越性:正是文字的诞生使得他的学生柏拉图有可能记录下老师的谈话而使之流传后世。当最初的印刷品《圣经》传播时,许多圣徒认为是对手抄《圣经》的亵渎,但他们忽略了印刷品的优越性:人手一本《圣经》成为可能。当今人们关于电视、网络的争论依然反映了这一定律,正如美国媒介哲学家利文森(P. Levinson)所指出的:“今天对于全部电子媒体包括计算机在内的猛烈的学术攻击,都是源自由来已久的对新媒介的焦虑而反过来希望保护书写媒介。”

第二节：文字书的载体材料

自有文字开始，人们就设法利用各种载体材料，表达知识内容，传递思想文化。在文字出现初期，树叶、树皮、龟甲、金石、泥陶、竹子、木板等天然材料，都曾被当作书写之物，它们取材便利，手边之物，予取予求。与简牍同时期使用的缣帛，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因为是人造纤维，已然不是天然材料，但由于价格昂贵，不能大范围推广。汉代造纸术的发明，提取植物纤维人工合成，特别是蔡伦对造纸技术的改进，使纸张逐渐价廉物美，成为人们日常书写的工具。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文献信息储存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型的文字载体，主要包括缩微载体、音像载体和机读型图书、E-book的电子载体、网络载体，以及被称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等。

从古至今，记录汉字的载体，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十种：

甲骨时期：1. 甲骨（龟甲、兽骨）；2. 青铜器（钟鼎）；3. 玉器。

简帛时期：4. 石头（石碑）；5. 竹简；6. 木板（版牍）；7. 缣帛（帛书）。

纸张时期：8. 纸张。

电子时期：9. 缩微胶卷；10. 移动存储设备。

中国远古的文字记录，有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古人喜欢佩玉，玉器上往往也刻有文字。这些文字记录，附着于器物（甲骨是用来占卜的，青铜器、玉器有本身的用途），它们有图书的某些职能，但没有整合成卷册，缺少独立的形态，只能算是图书的雏形，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图书。

春秋战国以后，文字记录主要写在竹片、木板上，并串连成册。竹片上有字称竹简，木板上有字称版牍，合称简牍。竹简组合起来称册（卷），后来的图书以册、卷为计量单位，即本于此。今之竹帘，如把细竹片加大宽度，写上文字，就很像串连成册的竹简。战国和秦汉，文字记录有的又写在缣帛上，可以折起来或卷起来，称之为帛书。后来唐代图书装帧有“经折装”，元代杂剧场次称“折”，也与此有关。《墨子》上记载：“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其中提到了竹（竹简），帛（帛书），金（青铜器），石（石器、石碑），盘盂（青铜器，玉器）。现代1942年，曾发现过秦朝的帛书（缣书）。秦朝又把文字刻在石头上，称为石鼓文。秦始皇出巡泰山时，又多立石刻辞。这时期，竹简、版牍、石碑、帛书，成了独立的图书载体。其中石碑，到了纸质图书时期，仍有

制作。流传至今者，数量甚多，据称约十万有馀。

东汉有了纸张。范曄《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用。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东汉和帝元兴元年是公元105年。蔡伦造纸并改进了技术，用纸写书也就逐渐增多。东汉有了书肆，可以出售出版物，说明一种书已经可以抄写成好多册。不过这时书肆出售的图书，主要还是竹简。用纸写书，始自东汉，魏晋南北朝逐渐盛行。《后汉书·蔡琰传》记载，曹操想派十名官吏到蔡琰家抄录出版物，蔡琰说：“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这里提到纸笔，显然蔡琰所抄写之书，就是纸书。不过，这些纸书的形态，是可以舒卷的长卷（如同画卷），仍然跟现代装帧不同。

东晋末年，桓玄（公元369—404年）正式下令废简用纸：“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世说新语·文学》上记载：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这里已明确记载了用纸抄写文章。纸比缣帛要便宜，自然就逐渐代替缣帛。纸书的出现，是一件大事。当时的诗人在作品中，对于纸的应用，大加歌颂。晋代傅咸《纸赋》写道：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将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己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这里提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显然是指可舒卷的长卷纸书。南梁的萧绎《咏纸》写道：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渔网时！不过唐以前的纸书，大多没有留存下来，只在石窟古墓中发现了一些汉代的竹简。东晋以后的文物，出土者已见不到竹简，表明已经完全被纸张所取代。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发现了晋代纸书《三国志》残卷，说明晋人确实用纸写书。

唐代中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文字印在纸上。雕版印刷图书，这又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雕版时，先用纸画出边栏界行（竖行的界线），再抄写文字，然后把纸反贴在木板上，用刀雕刻。涂墨印刷后，装订成卷。一种书稿可以印成好多册，一种雕版又可以再度翻刻，这样，就有了纸书的不同版本。唐代纸书多为卷轴装。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宋代开始大量用雕版印刷图书，现在见到的古代典籍，都是靠宋以后的刻本得以流传。此时的纸书多为蝴蝶装，包背装。印书用纸，有蜀地（四川）出产的麻纸（原